

新技术革命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

陈永志

摘要: 新技术革命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劳动过程的某些新变化; 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进一步分离; 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关系和生产经营管理进一步发展。新技术革命也引发了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 劳动与资本变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一步深化。然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并没有过时, 因为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性质没有变, 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实质依然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关键词: 新技术革命 资本主义 生产劳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受新技术革命的影响,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也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怎样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成为当前经济学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新技术革命引发一般劳动过程的新变化

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般是从劳动过程开始的。因此, 我们对问题的探讨, 也以此为起点。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劳动过程, 出现了与机器大工业时期不同的某些新变化, 这些新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在物质生产部门中, 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进一步分离。与农业部门不同, 传统的工业部门的生产一般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其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不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但是, 在科技革命的作用下, 这些不受自然条件制约的工业部门, 其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也会出现分离的现象。在工场手工业时期, 劳动过程三要素的结合和相互作用, 是在人的直接操纵下实现的, 这里, 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机器大工业时期, 由于机器的发明和机器体系在生产中的应用, 人的体力耗费大为减轻, 先前完全依靠人力的动力职能、传动职能和操作职能, 分别为动力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所代替, 人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机器体系的运转, 操纵工作机进行劳动。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绝大部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仍然是一致的, 但已经有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如工业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等)的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产生了分离。进入新技术革命时期后, 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 使人类生产由机械化步入自动化时代。电子计算机和微处理机的广泛应用, 使劳动过程发生了进一步变革。这时, 机器体系除了原来的动力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三部分以外, 又增添了第四部分——控制机。人们可以利用控制系统, 按照事先编制的程序, 自动指挥和调控机器的运转, 从事对劳动对象的加工。

这种自动化体系在生产实施中的应用, 改变了过去劳动者对机器控制的状态, 进一步减轻了劳动过程中的人力耗费。同时, 自动化生产使生产过程的主体向机器身上转移, 劳动者逐渐退出直接劳动过程, 他们从操纵工具机进行劳动, 变为监视和维护自动控制机进行劳动了。美国学者希赖特曾经对自动化生产作过系统研究, 他在《自动化与管理》一书中, 把生产工艺的 17 个等级概括为四大级别: 手控、机械装置控制、信号控制和可变控制, 证明人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随着生产工艺级别的提高而递减。同时指出: 在自动化的最高级别中, 巡逻成为工人的主要工作, 原来的操作工人变成看守员、监视员, 也可以看成是机器和业务管理人员之间的联络员。这些状况, 验证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劳动过程的科学预见: “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 相反地, 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 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如果说, 过去的技术革命使机器代替人手操作工具, 实现了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初步分离, 那么, 新技术革命则使电子信息机器逐步代替人操作机器, 从而实现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分离。

其次,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发展。只要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 就必然存在着因劳动职能独立化而形成的分工协作关系。在机器大工业时期, 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不仅保留和发展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 即产品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生产分工和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的分工, 而且使分工协作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客观技术基础上。更明显的变化是, 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发展到完全分离的程度。生产工人专门从事简单划一的体力劳动, 而脑力劳动完全由经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来承担。生产过程这种分工协作的发展, 使产品由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 转化为不同劳动者联合劳动的共同产品。在这些不同的劳动者当中, 除了包括各类从事直接操作的生产工人之外, 还包括经理、工程师、工艺师、技术员和修理工等等。

然而,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生产过程的这种分工协作基本上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到了新技术革命时期,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并不断向科学化、信息化发展,分工协作关系也必然突破单个企业的界限,向外部扩展。

第一,企业内部直接生产过程的协作分工,进一步发展到企业外部。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是由垄断公司主宰的。这些大公司,都拥有许许多多企业,形成一个企业群体。各个企业只是局部产品或者局部工序的生产者,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只能在企业间的纵横协作中完成。如今许多现代产品,其零部件的生产,不仅涉及到企业内部不同工种的分工,而且涉及到不同的专业化企业之间的分工。例如波音747客机的生产,就是由15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中小企业参与分工协作的结果。其中不仅有美国的企业,而且还包括英国在内的6个国家的企业。协作单位提供的元件,占飞机构件总重量的70%。另外,企业内部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也大量发展为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企业之间的分工。例如一台数控机床的生产,包括矿藏的开采、筛选,金属的冶炼、轧材,毛坯的铸造、加工,电子器材的生产、制作,以及各种部件的组装等一系列工序。这样繁多的生产工序,是任何一个单独企业都无法包容的。只能分解成不同生产企业的独立职能,通过矿山、冶金、机械制造、电子装配等不同企业生产过程的互相衔接,最终形成完整的生产过程。而所有这些相互协作的企业,则构成一个生产最终产品的庞大的企业群。

第二,企业内部为生产服务的职能分工,进一步发展到企业外部。随着专业化协作的发展,原来企业内部的设备安排、零件维修、物资运输等生产职能,也独立出来,发展为企业外部的专门化服务公司。例如,美国在农业生产上的专门化服务就很发达。有人测算,目前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3.6%,但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行业,诸如提供农业机械、耕作、收割服务,提供农产品储藏、加工、运输服务等行业的劳动力却约占总劳动力的10%。

第三,企业内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职能分工,进一步发展到企业外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推动着企业生产不断革新,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新技术和信息成倍地增加,这就决定了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科技、技改、咨询、情报、预测等脑力劳动的工作,远不是能由单个企业自己完成得了的,其大部分只能由独立化的社会职能部门来承担。目前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设有专门的科技服务部门,这些部门虽然独立于物质生产企业之外,但与企业的生产协作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为企业提供最新科技信息,进行新技术开发和应用,从事新产品研制等等。它们不仅为单个企业服务,而且为一个企业群体服务,甚至为整个行业、部门服务。由于这些处在企业之外的科技性脑力劳动,通过向企业提供科技信息服务而参与了物质生产,实际上成了企业物质生产总过程的厂外部分。生产过程分工协作关系的所有这些变化,表明现代产品的生产已经突破了单个企业的界限,原来的物质生产过程已分化为若干个不同的生产过程,互相之间以独立的形式衔接起来,共同完成一个完整的产品生产。

最后,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经营管理也进一步发展。不仅管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管理的范围也

在拓宽。现代化的通信设备、交通工具和情报分析加工系统的广泛应用,为管理的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家大公司,都必须对分设在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所属企业进行统一管理,对成百成千种产品的生产进行统一计划和调配。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撇开设在国外的分公司企业不说,仅在美国就分别在25个州设有127个工厂,在全国各地设有13400个推销点,另外还办有30个技术培训中心。如此庞大的生产、销售、科技体系,没有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整个生产经营活动是不可能正常运行的。而这种管理的现代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

总起来看,新技术革命引发了一般劳动过程的某些新变化:使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进一步分离,使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关系和生产经营管理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间接劳动的作用在增大,劳动过程由原来的直接劳动为主转变为现在的间接劳动为主。二是脑力劳动的作用在增强,劳动力的使用由原来的以体力支出型为主转变为现在的以脑力支出型为主。与此相联系的,从单纯劳动过程考察的生产劳动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内涵、范围必然要相应地扩大。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过程中直接生产工人的劳动,而且包括与物质生产有关的非直接生产工人的劳动。前者是在厂房、车间、生产流水线上看得见的,后者则不一定在厂房、车间甚至企业、公司里看得见。这部分非直接生产人员对物质生产的作用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它不仅包括企业、公司内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而且还包括企业、公司外部为物质生产服务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一句话,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从单纯劳动过程考察的生产劳动范围,必然要相应地扩展到企业外部。

二、新技术革命引发劳动与资本交换关系的新变化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不仅劳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首先,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机器大工业时期,作为近代科技结晶的大机器及其资本主义应用,为妇女儿童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提供了可能,也成为必要,从而增加了资本的人身剥削材料,扩大了资本的剥削领域。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代表现代科学技术的自动化机器体系在更大程度上为垄断资本所占有,成为资本侵入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有越来越多劳动过程的重要手段,迫使更多人加入雇佣劳动大军的行列。

先从物质生产领域看。新技术革命犹如一把双刃剑,对劳动就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过程的电气化、自动化,引发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会导致劳动就业率的降低和就业人数的减少,这种情况在某些部门和一定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又会引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变革,导致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整个社会和较长的历史时期看,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劳动与资本交换关系的扩大。有关资料显示,从1950-1990年,美、日、西德、英、法五国的就业人数,由1677万人增加到26669万人,后者为前者的1.6倍。反映了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并未导致总体就业人数的减少,反而扩大了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

系。

再从非物质生产领域看。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占绝对优势,资本家阶级主要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大多是为了少数资产者服务的,属于同收入交换的劳动。虽然这种服务劳动的人数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但是真正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数量却很有限,同物质生产领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劳动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竞相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革产业结构,一方面抢先发展以电子技术为主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大量运用电子计算机、遥控、遥感等现代科技进行老企业改造,这就促使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引发物质生产领域就业人数的比重逐渐下降,大批劳动者向非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迅速扩展的同时,大部分服务性劳动也由原来的个体劳动方式转变为社会劳动方式,由个人经营转变为资本主义经营,使非物质生产领域成为资本家阶级攫取利润的重要领地。有资料显示,19世纪初,美国不受资本雇佣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4/5,1880年占1/3,1950年占1/5,目前只占不到1/10。

总之,在目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资本对一个个部门的蚕食,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导致几乎所有劳动都在资本的控制之下。这就表明,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几乎囊括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角落,以致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轨道,在这些领域中的劳动者,也一个个沦为资本的臣民。

其次,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劳动隶属于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马克思把这种隶属关系区分为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两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物质技术条件的变化,不仅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会转变为实际隶属,而且会使实际隶属关系不断强化。在简单协作阶段,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还缺乏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劳动还只是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开始由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过渡。机器大工业阶段则完成了这种隶属关系的过渡。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也进一步强化。表现在:

第一,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应用,强化了劳动条件对劳动的支配作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这种颠倒随着劳动资料的不断变革,在技术上取得了愈来愈明显的现实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处于生产线上的工人,基本上要听从电子计算机的指挥,服从劳动资料的运转,成为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活的组成部件。他们往往被固定在某个专门岗位上,按照自动机的运转速度和节奏,不断重复同一个机械动作。被动而紧张的劳动,单调而乏味的工作,侵吞了工人的自由活动和生产志趣,使他们在更大程度上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第二,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使资本对劳动的管理进一步加强。随着劳动条件和工人劳动的变化,资本主义管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资本利用先进的劳动资料来监视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中,电子计算机已取代人工,执行对整个过程的监督职能,因此对工人劳动的监督管理也更加严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剥削》一书指出:“这种系统工作得很出色,甚至已经死了的同事也因缺勤太多而被按期解雇。”二是资本运用“行为科学”等现代管理理论,加强对劳动的控制。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引发的劳动结构变化,资本家阶级从“行为科学”、“系统理论”中寻找现代管理的依据,千方百计“从人的行为本性中激发出动力”。他们在生产上建立所谓“人造环境”,通过工人“参加管理”,在企业里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用以消除工人的阶级意识,使其成为资本的驯服工具。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信贷的普遍实施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就是两个典型要素。因为消费信贷的实施,使劳动者沦为信贷的奴隶,不仅使他们在生产领域,而且使他们在消费领域隶属于资本;不仅使他们现在的劳动,而且使他们未来的劳动隶属于资本。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则不仅使劳动隶属于个别资本,而且同时隶属于总体资本。

总之,在新技术革命作用下,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有了进一步发展,雇佣劳动更加牢固地被钉在资本的柱上。造成这种经济现象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科学技术如同自然力一样,被并入资本,不仅成为资本的强大生产力,而且成为资本加强对劳动控制和统治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科学技术愈是发展,资本对劳动控制和统治的物质技术基础就愈是雄厚,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也就愈是加强。

最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科学技术并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由于科学技术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生产的要素,使资本的生产率大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不断增多。虽然,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使得工人阶级的工资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但是,新技术革命带给工人的好处是有限的,这种好处主要落在资本方面。工人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始终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点。有资料显示,1960-1973年日本各产业部门的法人企业总资产增加8.2倍,纯利润增加8.1倍,而工人的平均工资增加4.1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只增加1.4倍。据统计,美国物质生产部门(农、林、渔业除外)的剩余价值率,1950年为241.2%,1960年为247.6%,1970年为255%,1977年为280.9%。原西德能源、采矿、加工和建筑业的剩余价值率,1950-1952年平均为204.1%,1953-1957年平均为206.1%,1958-1965年平均为224.6%,1966-1970年平均为246.1%,1971-1974年平均为265.1%。日本工业的剩余价值率1951年是275%,1976年提高到431%。由此可见,在新技术革命的今天,工人工资的增长与资本增殖率的提高,可以并行不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是减轻了,而是加深了。

造成这种经济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一,技术革命带来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使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据原西德政治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反映,由于采用了现代化机器和工艺,西德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由1950年的2小时51分缩短到1970年的2小时零9分。这样一来,为资本家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就大大延长

了。第二,新技术革命带来工作日的缩短,但工人的劳动比以前更加紧张。日本经济学家不破哲三指出:这种精神疲劳和神经极度紧张的情况,在今天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程度,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第三,新技术革命引起管理的变革,使剥削更有成效。伴随着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物质技术条件的变化,资本对劳动的指挥和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形式。早期阶段的那种棍棒纪律,已被现代文明的“行为管理”所代替。资本家阶级采取种种手段,来缓和劳资矛盾,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刺激工人的进取心和首创精神,提高工人的劳动质量和工作效率。这种剥削手段,比起机器大工业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显得更为巧妙和更有成效。第四,新技术革命引起劳动结构发生变化,更有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现代企业的雇佣劳动中,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多。相当于简单劳动来说,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里可以为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是常识。

总之,新技术革命引发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资本交换关系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纵横两个方面:从横的方面看,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进一步拓宽,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囊括了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所有角落;从纵的方面看,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其剥削率之高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三、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过时了吗

新技术革命引发了一般劳动过程的新变化,也带来了劳动与资本交换关系的新特点。尤其是新技术革命导致了物质生产劳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非物质生产劳动的比重不断上升;促进了生产过程分工协作关系日益扩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产生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相互交融。面对着资本主义社会新出现的这些经济现象,有的同志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产生了怀疑,有的同志认为它已经过时。那么,在新技术革命作用下,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否已经过时?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从科学技术的性质来看,它属于一般生产力而不是直接生产力。科学技术只有加入物质生产过程,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转化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的:一是变革生产资料,改进控制系统,革新工艺流程,增加物化劳动的效率。二是改良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实现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优化结合。三是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水平和生产技能。实际上,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也就是它本身转化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过程。在新技术革命作用下,虽然科学技术的物化过程出现新的特点,但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的根本性质没有变,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

首先,一般劳动过程的性质并不因新技术革命而改变。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一般劳动过程是劳动者借助于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以改变自然物质的过程。在劳动过程的诸要素中,劳动者是决定性要素,虽然各个经济时期的生产劳动形式不同,但劳动者的这一决定性作用都是共同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出现了新的特征——劳动者愈来愈不直接操纵劳动资料和接触劳动对象。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自动化的

生产使劳动者不仅不需要直接操纵劳动工具,而且也不需要直接控制机器体系,而是按照已经编好的生产程序,站在生产过程之外,靠按电钮、发指令等高级劳动,通过自动控制就可以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从表面看来,似乎人的劳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其实不然,不管自动化发展到多么高的程度,生产活动永远离不开人,离不开劳动者的劳动。虽然自动化使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发生了分离,劳动者可以站在生产过程之外工作,但他们仍然是利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区别仅在于,劳动资料已经由过去的简单劳动工具,或者普通的机器体系,发展成现在的自动化生产系统,但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仍然需要耗费一定的体力和脑力。诚然,自动化大生产改变了劳动者的劳动形式,过去是体力劳动为主,但劳动的内容同样属于人类的一定筋肉、神经、大脑、手等等的耗费。由此可见,新技术革命虽然导致了生产过程出现了新的特点,但劳动过程的根本性质未变,劳动者支付劳动能力的内容未变,劳动作为生产使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也未变。

其次,总体工人范围的扩大也没有改变结合劳动的性质。总体工人是由劳动过程的分工协作性质产生的。在这种协作的劳动过程中,劳动的不同职能,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承担,产品成为总体劳动者结合劳动的产物。劳动过程的这种分工协作关系,必须使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者的概念相应扩大。在总体劳动者当中,不一定都要亲自动手直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只要完成结合劳动中的某一职能就行了。这样,凡是参加物质生产过程的成员,不管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是工程师、技术员,还是操作工、修理工,都是生产劳动者。在新技术革命作用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劳动过程的分工协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总体劳动者的范围也必然相应地扩大,由原来单个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那些在企业外部为直接生产过程服务的设备安装、零件修配、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信息咨询、新产品研制等部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都在生产劳动者之列。这种总体劳动者范围的扩大,同样不会改变结合劳动的性质。它只不过是结合劳动职能的分解和组合出现了新的变化:职能的分解比以前更细更杂,职能的组合比以前更宽更广。这种分解和组合的进行,由过去的企业内发展到现在的企业外部,其形式也由过去的紧密型发展到现在的松散型。然而所有这些变化,仍然是围绕着物质资料的生产出现的,因此,结合劳动的性质未变。

再次,物质生产劳动比重的下降并没有改变其原有的重要地位。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任何社会要想扩大非物质生产领域,就必须大力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战后发生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引起物质生产领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物质生产领域转移,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物质生产劳动的比重大幅度下降,非物质生产的劳动比重大幅度上升。然而这种经济结构的大变化,也没能改变物质资料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反而是物质生产决定非物质生产这一规律得到贯彻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物质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扩大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下转第44页)

果见表 7。

表 7 1993- 1997 年各地区工 业生产回归方程估计结果					
回归系数	常数	L nK	L nL	F	R ²
东部	0. 741 (3. 159)	0. 599 (8. 627)	0. 485 (7. 508)	548. 697	0. 955
中部	- 0. 684 (- 0. 839)	0. 744 (5. 591)	0. 833 (4. 442)	60. 084	0. 765
西部	0. 229 (1. 802)	0. 573 (9. 127)	0. 550 (10. 359)	606. 831	0. 963

说明: 各省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存量、全部工业从业人员 3 项指标,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仅有 1993 年以后的数据, 且 1998 年以后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 故仅能就 1993- 1997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中部地区的回归方程, R^2 值为 0. 765, 表示方程的拟合效果不很理想, 这可能与中部各省份的发展差异较大有关。东部和西部地区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 R^2 值分别为 0. 955 和 0. 963, 显示回归方程对数据描述的代表性超过了 95%。对比东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 $L nK$ 的系数为 0. 599, 西部地区为 0. 573, 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效率要高于西部。

三、结论

虽然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存在很大差异, 特

别是经济发展水平, 无论是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是以工业总产值衡量, 东西部差距都呈加速扩大的趋势。但这种发展差异并不是由于资金投入的差异造成的, 而是在于资金的利用效率, 在于西部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经营特点更为突出。如果不改变这种资金低效利用的状况, 一方面, 资本市场化改革将会使资金由于趋利而更快地逃离西部; 另一方面, 政府加大西部投资只会造成人为的资源低效配置, 并且从长期来看这种投入也缺乏持续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周天勇:《从政府经济走向社会经济》, 载《经济学消息报》, 2000- 10- 06。
2. 白永秀:《关于西部大开发中政策支持的几个问题》, 载《经济体制改革》, 2000(1)。
3. 田秋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与对策》, 载《改革》, 2000(2)。
4. 蔡昉:《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 载《经济研究》2000(10)。
5.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 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9。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责任编辑: Q)

(上接第 6 页)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去。也正因为物质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 社会拥有的衣、食、住、行等生存资料大量增加, 人们的需求结构和消费方式才会发生变化, 对劳务和精神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才会增多, 这些非物质生产也才会相应地发展起来。由此可见, 不管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如何变化, 物质资料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是始终不会动摇的。

最后, 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变化并没有离开剩余价值这根轴心。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以来,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就一直靠剩余价值这根轴心维系着。不管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采取什么形式, 是赤裸裸的榨取, 还是披着文明面纱的巧妙的剥削, 其实质都是资本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战后, 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向纵横两方面发展, 表现在资本对劳动统治范围的扩大、剥削程度的加深, 还表现在劳动对资本隶属关系的强化。但是, 劳资关系的所有这些变化, 仍然是围绕着剩余价值这根轴心进行。因此, 可以说,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社会规定性没有变。新技术革命引发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新变化, 只不过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进一步发展而已, 并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根本质变。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 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劳动过程和特殊的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 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实质没有变, 依然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作为生产劳动的完整概念, 也依然是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劳动的社会规定性的统一。马

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它仍然是我们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理论依据。当然, 受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和作用,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围绕着剩余价值生产这一中心环节, 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关系扩大了, 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发展了, 我们在具体确定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范围时, 也应该实事求是, 根据实践的变化发展来把握。这样, 才不致于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出现的经济现象所困惑, 也才能够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所出现的新变化分析清楚。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46 卷下册, 21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98(141)。
项启源:《新技术革命与劳动价值论》, 载《学术月刊》, 1995(10)。
转引自郑伟民等:《战后资本主义经济》, 195 页,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参见日本大藏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 1996 年。
《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载《厦门日报》, 1996—09—06。
陶大镛主编:《马克思经济理论探索》, 39 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第 13 卷, 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N)